

第20次会议简要记录

主席:

查图维迪先生

(印度)

目 录

议程项目137: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94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94-81853 (c)

Distr. GENERAL
A/C.6/49/SR.20
21 Nov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上午10时1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137：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续)(A/49/10、A/49/355)

1. Yoon-Kyung OH先生(大韩民国)感谢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宝贵工作,赞扬委员会主席明晰地介绍了委员会的报告,欢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草拟工作已经完成,并特别赞赏负责草拟工作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工作组及其主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2. 大会第47/33号和第48/31号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优先处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问题,反映出国际社会意识到现在该是接受个人对国际罪行的责任和设立刑事法院处理这些罪行的时候了。不能再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法庭而允许公然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逍遥法外。规约草案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稳妥健全的基础,值得各会员国彻底审查。

3. 这个问题尚须加以更详细地研究,但他想提出如下评论:第一,关于设立法院的问题,他赞成一个在必要时行事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虽然使法院成为联合国一个机关会使它具有权力和合法地位,但这却可能引起若干棘手的法律问题。因此,以多边条约方式设立法院并以一项具体协定使它与联合国联系起来是一种既灵活又实际的办法,似乎比较可取。至于法院的组成问题,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具有刑法经验的法官和具有国际法专业能力的法官之间作严格区分。

4. 第二,谈到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他认为新的草案在两方面明显地胜于先前的草案:关于管辖权的规定已经简化和澄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定义必须确切。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也是一样。该原则要求具体界定各种罪行。虽然第20条可能仍不够确切,但目前的提法似乎足以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为规约主要是一项程序性文书。

5. 第三,关于国家接受法院管辖权的问题,他高兴地注意到新的草案采用“选入”制度作为通则。但是该制度不应挫败设立法院的特有宗旨,即:将罪犯绳之于

法。因此,必须允许对接受的条件作出两个例外:对灭绝种族罪的固有管辖权问题和安全理事会诉诸法院的任何案件。

6. 第四,虽然关于刑事诉讼的规定在新的草案中已有改善,但某些方面仍有问题:例如:第26(5)条允许院长会议复查检察官不予调查或起诉的决定,但这可能大大削弱检察官的独立性;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第42条规定,如有关行为被定性为普通罪行,则这一原则不适用;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那就是法院经费的筹措问题。

7. 过去几年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别的地方发生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事件已为一个常设刑事法院的成立创造了期待已久的势头。国际社会不应错过机会,以便创立一个打击国际关注的罪行的机制。因此,如果要预期的法院成为有效的机构,则规约草案必须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地支持。必须抓紧这个大有希望的时刻,但寻求共同点也同样重要。在召开外交会议之前,我们需要时间审慎研究草案,而且各国需要时间在一次筹备会议或非正式会议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协商,以便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共识。

8. KOTSEV先生(保加利亚)赞扬国际法委员会主席明晰地提出了委员会的报告,并对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所取得的可观进展,特别是最后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表示赞赏。他还感谢国际法委员会其他成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献身精神和专业态度。

9. 国际法委员会优先审议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而且更具体地优先迅速地完成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工作,它不仅听从大会第48/31号决议的要求,而且也证明它有能力满足国际社会的急切期望。保加利亚一向赞成设立一个对违反国际法的最严重行为有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机制的建议,并重申它坚决承诺打击这些罪行的一切形式。保加利亚深信最终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将是阻吓可能从事这种罪行的人的有效手段。

10. 目前的规约草案大大胜于先前的草案,是一份既灵活又稳当的文件,使设立

国际刑事法院的需要和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调和一致。此外,它也符合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则以及现正生效的刑法方面的国际法律文书。国际刑事法院应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补充的前提是健全的,因为这将有助于它为各国所接受,提高镇压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的效力。

11. 草案是进行谈判以期达致共识的良好基础。但是,应当指出一些缺点和有异议的领域,这些缺点和异议都是主题的复杂而敏感性质所造成的。第一,关于设立法院的问题,保加利亚认为通过多边国际条约的方式设立法院比较可取,因为这将使法院享有作为一个客观公正机构的声誉。此外,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应由一项独立的协议加以确立,这项协议应规定由联合国承担经费。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法院作为一个常设司法机构进行运作是可以接受的,但它应只有在必须审理提交给它的案件时才开庭。关于法官的选举问题,对具有刑事审判经验的人士和具有国际法专业能力的人士加以区分过于绝对,要求具备其中一项资格已经足够。

12. 第二,关于法院管辖权的复杂问题,保加利亚赞成新的草案第20条的区分,该条规定法院对两类罪行具有管辖权,即:一般国际法下的罪行和条约所确定的罪行。至于其他罪行,则必须对附件所列的罪行进行更审慎的分析,因为其中一些罪行可能根据或引渡或审判原则,通过国家间合作而获得更有效的检控。保加利亚还赞成自愿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想法,除非是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固有管辖权”的情况,或由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提出案件的情况。

13. 关于国家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制度,保加利亚在上一届会议曾表示,最适当的是这一管辖权对规约缔约国属强制性性质。但是,保加利亚了解到务实的办法是第22条所规定的“选入”制度。

14. 关于法院适用的法律问题,无疑可适用的法律来源应是法院规约、有关的协定、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国内法的规定。去年,保加利亚曾坚持认为国家的国内法不应作为可适用的法律的来源,即使是间接的来源,因为罪行和惩罚在国内法内有不同的定义,从而会违反法院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将

引起按标的物确定管辖权的问题,而这种管辖权的根据应是明确界定并获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规定法院的高效率运作所需的实质性法律基础的最适当国际文书,就是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国际法委员会应加速进行它就这个专题所进行的工作,并界定不同类别的最严重罪行和有关惩罚;这样,法无明文者不罚原则将获遵守。

15. 保加利亚实际上承诺打击一切形式的最严重国际罪行,并赞成设立一个为各国广泛接受的有效的国际刑事法院。应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便达致广泛的共识并将规约草案案文最后定下来。最有效的对策将是由大会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筹备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外交会议。

16. NATHAN先生(以色列)对国际法委员会在拟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方面所完成的缜密和呕心沥血的工作表示祝贺。这项任务充满高度错综复杂的问题,因为所涉的国家的法律制度各有不同。他假设在今后某一阶段这套规约可能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联系起来,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17. 他虽然确认目前审议的草案有重要的变动,但他想提出一些评论。关于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第2条),法院不应一定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成为它的司法机关。为确保法院尽可能被接受和尽可能有效,以条约方式作出承诺是必不可少的。同样,联合国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应以协定的方式建立。关于法官的资格和选举(第6条),他不认为所有法官均须具备刑事审判经验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但大多数法官都应有这种经验却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审判分庭内。他进一步建议作出规定,使法官有权辞职,如《国际法院规约》所规定那样。关于法官暂停资格(第11条第3款)的问题,要求这样的暂停资格的理由应予明确规定。检察处(第12条)应独立于法院,不应是法院的一个机关。第12条的提法:“检察处是法院的独立机关”似乎有矛盾。检察处要么是“独立”,要么是“法院的机关”,但不能两者皆是。

18. 关于特权和豁免(第16条)的问题,规定法官在任职期间即使在休庭时享受各种特权和豁免,与《国际法院规约》第19条相比,似乎是含义深远的。关于法院的规

则(第19条),他不否认证据规则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重要性,但却不认为应在规约本身明确界定这些规则。另一方面,将第41条第1(g)款和第44条所订立的规则加以扩充,列入一些基本的证据规则,可能是有用的。

19. 在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应是令人特别发指、应备受国际关注而且应有确切定义的罪行。它们应被普遍公认为犯罪行为,而且就条约规定的罪行来说,这些条约应争取国际社会的最广泛接受。

20. 根据第20条,草案对两类罪行加以区分。分款(a)至(d)处理一般国际法下的罪行,分款(e)处理“条约所规定的罪行”。第20条应明确地列入“恐怖主义”一词,理由是就列举针对平民的具体犯罪行为来说,恐怖主义的罪行符合列入这一条内的一切必要条件,而且已被确认为国际法下的一项罪行。在分款(d),“严重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和习惯一词不够明确,而分款(e)则规定限制法院对所列条约规定的罪行的管辖权;虽然这种限制可能是必要的,以确保法院只处理异常严重的罪行,但它在解释和适用方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21. 规约附件载列的根据条约确定的罪行清单至少就目前来说不应包括各项《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因为这项《议定书》与各项《日内瓦公约》不同,它不符合被广泛甚至几乎被普遍接受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同意加拿大代表的建议,认为应列入1988年《禁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该《议定书》是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补编。

22. 第21(b)条也应包括被告国籍国接受管辖权的规定。关于第22条,他赞成接受法院管辖权的选入程序,但他对第23条的规定有所保留,因为安全理事会是一个政治机关,绝不应卷入起诉个人的活动。实际上,如果它是确定是否犯下侵略行为的第一个机关,而这种行为是申诉的事由,则它的决定可能妨害法院的最终裁决。因此,删除这一条将更为可取。

23. 关于起诉问题,第27条规定检察官在院长会议允许下应有权修改起诉书。第37条所载的对被告应在审判时出庭的原则所作的例外影响深远,应予限制。关于

第38条,他建议允许被告:抗辩起诉书没有公开《规约》管辖的罪行;要求提供关于起诉书的进一步细节;请求对起诉书作出修正。

24. 第39(a)条应更为具体,而且应规定行为或不行为属第20条下的罪行,这意味它也属国际法下的罪行。分款(b)的第二句应改写为:“有关行为或不行为发生时这种行为或不行为属有关的条约下的罪行”。

25. 关于第41(g)条,他指出在以色列法律下被告享有缄默权和不作证权,但这种缄默可被解释为使控方的证据更有份量,而且在需要确证时使证据更为有力。关于证据,他建议在第44条增加一款:“应在根据第19条制定的《法院的规则》所列的证据规则下,制定其他证据规则”。第3款应有一项规定,说明有关裁定应在听取当事方或其代表后才予作出。

26. 第45条第1款涉及法定人数与判决,它应规定审判分庭的全体法官在审判的所有阶段都应出庭。这样,第3款就可予删除,因为所有审判分庭都将由奇数的法官组成。此外,第5款应规定异议判决的可能性。关于涉及刑罚的第47条,可适用的刑罚应绝对确凿,而且原先就应按犯罪地国现行规则对被告判刑,因为本来就应在该国对他绳之以法。

27. 关于第49条,以色列代表团认为,根据第50条第3款,而且除了证据被审判分庭错误地排除的情况外,上诉分庭不应听取证据。应在分款(a)和(b)增加一项规定,授权上诉分庭将案件送回审判分庭处理,并酌情作出指示,包括听取新的证据和作出新的判决。

28. 关于第51条,法院应有权要求临时移交证人,以便对质和援引证据,并提供必要的津贴和旅费等。

29. 最后,他建议第53条应规定被告有权按照引渡公约普遍规定的程序并以这种方式对逮捕和移交被告的拘票提出质疑,而且也应规定在等候移交时可以保释。第53条第4款提出了将法院提出的请求列为优先于其他国家根据现有引渡协定提出的请求的问题。他建议请求国在这方面应有选择。

30. CHIMIMBA先生(马拉维)赞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宗旨,并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案文是稳当的。但是序言部分却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然后才召开全权代表国际会议以通过规约。必须评估设立法院对国际法发展所涉的法律含义,以及法院在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中所起的作用。

31.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是对当代国际法的主权原则的一项严峻考验,必须断定是否已达致适当的平衡。在设立这种临时法庭来调查非常严重的事件时,援引的理由是否比仅仅在常设和临时机构之间作出选择更为基本?常设法院对国际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32. 关于法院有管辖权的罪行,区分“个别”和“系统”的犯罪性似乎是恰当的,换言之,区分为了自私理由犯下的罪行和在当局的鼓励或默许下大规模犯下的罪行。附件所列的一些条约只规定或禁止在国家间基础上的行为,因此很可能会引起问题,因为国家对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看法各有不同。

33. 虽然规约草案给予被告各种保证,但不知道整个制度的公平问题是否已予充分考虑。例如,将被告从国家管辖机构移交给国际管辖机构是否公平,特别是如果后者属常设性质?人权方面的考虑产生了是否达致适当平衡的问题。

34. 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是须予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目前正讨论改革联合国的可能性,这大概会涉及对《宪章》的修正。因此,提议法院成为联合国的主要机关之一看来不算言之过早,这样这个问题就成为整套拟议的改革的一部分。最后,他不赞成立即召开国际会议,他宁可在一个筹备过程中处理因通过规约而引起的问题,而这个过程亦可以与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活动联系起来。

35. HILGER先生(德国)说,近年发生的事件表明,国家无法起诉罪犯并酌情定罪的情况是存在的。许多区域冲突都出现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严重侵害人权的行爲,这表明有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以建立某种形式的普遍刑事管辖制度。因此,德国高兴看到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设立起诉对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德国意识到它在这方面的义务，为此拟订了一项法案，并于最近向立法机关提出，以便与该法庭合作进行稳固的合作。

36. 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是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种受人欢迎的办法，这个法院将须由一项条约设立。从实质性观点看，这项条约最好成为《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但鉴于随而产生的困难，可能必须选择多边条约的办法。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法院能与联合国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已设想安全理事会应能将案件交由它审理。另一个需要密切审查的问题是将法院纳入联合国系统的行政和财政问题。

37. 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规约草案，成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将依法接受法院对种族灭绝罪的管辖权。这种当然管辖权应予扩大，因为提出接受声明的制度可能导致法院不行使或行使极少的实际职责，理由是即使有足够国家同意法院的设立，但提出的声明数目不够。

38. 有几点须考虑。第12条规定检察处完全独立一点令人关注。为确保国际社会的利益在国际刑事法院中有足够代表性，检察官的活动应与联合国一个机关的决定联系起来，联系方式则尚待确定。法院的规则也须予进一步考虑：关于进行调查和审判的方式、特别是记录证据的方式的条例，应在规约本身加以规定。此外，第20条提到各种不同类别的罪行，但却没有说明其组成的事实或要素，这一点使人对必须清楚确切的原则有所怀疑，而这项原则在刑法中是必须尊重的。目前的第20条没有遵守在行为前已确定刑事责任的罪行才可科以刑罚的原则。这项缺点应予纠正，特别应参照就前南斯拉夫设立的国际法庭规约的相应规定予以纠正。第28条令人极不满意：规约应规定逮捕疑犯的确切条件，并确保他们在短期内提交主管法官审理。

39. 就被告来说，第41条所列的权利在原则上应当足够，但却应增添关于法律援助的条例，特别是对于法院必须指派辩护律师的案件而言。关于判刑(第46条)，应清楚表明主要的根据是罪犯的罪行，而定罪者个人的情况和罪行的严重性只起补充作用。最后，他认为规约没有明确规定刑罚的范围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以

“法院须考虑到”等字取代第46(2)条内“法院可考虑到”一语,则这一款的措词是可以接受的。

40. 总言之,草案为编纂法典提供了卓越的基础。因此,召开国际会议来详细讨论规约草案,以期缔结一项公约,是一个好主意,但会议须经审慎的筹备。

41. KARAM先生(埃及)在谈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时表示,早在大约50年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有人初次提出有必要设立一个这样性质的常设机构的想法。随着每天看到这些滔天罪行,这种需要就日形迫切。虽然近年来在国际关系方面标志着一些有利的发展,包括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关系缓和,但目前看来这些有利的发展都在区域和分区域两级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些区域和分区域,冲突日益加剧,内战层出不穷,犯罪和强奸、灭绝种族和“种族清洗”的事件愈来愈多。

42. 联合国对这种局面作出反应,成立了特设法庭分别审判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些法庭包括审判前南斯拉夫境内事件的国际法庭。联合国正在考虑将这个国际法庭的管辖权扩大,以包括在卢旺达境内犯下的暴行。成立特设法庭意味着要专门拨出时间和作出可观的努力,以缔结有关的协定。因此,埃及代表团认为一个常设法院是审判被指控犯下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的适当司法机关,如果这个法院是唯一的权力来源,则它将能避免出现相抵触的裁决的危险,因为这样的裁决可能使判决失去一些法律效力。

43. 就规约草案来说,最佳的选择是通过一项公约,其形式与联合国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将要缔结的公约相类似,以确立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其他拟议的方法将引起严重的困难。第一,认为法院应视为联合国的首要司法机关的看法与《国际法院规约》第1条相抵触,牵涉到对《规约》和《联合国宪章》的修正。第二个方案是使未来的法院成为国际法院的附属机关,但被接受的机会很微,因为这两个法院的性质和管辖权各有不同,不利于建立等级关系。

44. 关于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应由大会一项决议确立的提议,他认为这个方法已适用于若干国际公约。在这方面,他援引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

会的例子。但是,所涉的情况却有根本的不同:鉴于其地位及其功能的性质,法院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它不需要一个很大的秘书处部门来处理向它提出的案件。

45. 改写第42条第2(a)和第3款是可取的。虽然设立新的国际刑事制度无疑将更有效率和更加完整,但如无国家法院的合作,这种结果是无法实现的,国际法院必须补充国家法院的司法,但却不应取代它们的功能或漠视它们的判决或裁决。

46. 第23(1)条也应予重新考虑,因为根据第21条所述的国家权利来理解它和第23(3)条,就会引起歧义。如果法院要维持其信誉无懈可击,则它在行使其管辖权时必须没有任何政治方针或国际关系的压力。总言之,授权安全理事会将某些案件提交法院审理没有什么不妥,但这种提交必须不妨害一国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权利。因此,看来无须扩大安理会有权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的范围。但将这种授限于安理会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侵略案件却可能是明智的。可以想象甚至可能有一些法院决定放弃其管辖权的案件,其理由是没有违反规约和附件中所提到的国际公约,或安全理事会将某一事项提交法院审理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政治压力下作出的,即使安理会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理由。

47. 尽管他会在适当时提出一般意见和其他评论,但他认为规约草案是今后进行谈判的良好基础。他赞同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大会应召开一次最后签订规约的全权代表会议的建议,这个会议应于1995年召开。

48. MOMTAZ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关系的法律性质问题有根本重要性。这种关系不仅保护法院的特性和道义上的威信,而且也允许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联合国的服务,如草案第2条所规定那样。根据第2条,法院将按照《宪章》第五十七条缔结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协定,而这项协定将按照《宪章》第六十二条提交大会核可。

49. 第3(3)条和第4(2)条的标的物应在题为“法院的法律行为能力”的单独一条内处理,因为在关于法院所在地的第3条内提到这个问题似乎是不适当的。在第3(3)条,“议定书”一词比“协定”更为可取。

50. 第6(1)条所作的区分似乎过分严格死板。要求未来的法官符合两项条件中的一项已经足够。

51. 伊朗代表团坚持它在1993年就草案第15条所表示的保留。它宁可选择《国际法院规约》第18条采用的公式,主要是因为它属一般性质,不提及具体情况,因为这类情况肯定不常见。此外,全体一致规则所提供的保证比第15(2)条所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规则更为稳当,因为它有助于使法官的职责更有独立性。

52. 规约草案第20条是最重要的规定之一,但它有不妥之处。例如,四项《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所用的“严重违约行为”一词实际上适用于第20(c)条所列的所有情况。这些文书,特别是四项《日内瓦公约》,无疑是一项既定的国际习惯的表示,而且因为已有大批国家加以批准,它们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是同一级别的,虽然它们没有同样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威信。第20条列出具体罪行似乎十分明智,因为它有助于法院在各种十分具体的情况下行使管辖权。规约草案第20条没有将种族隔离罪和灭绝种族罪并列似乎是无可辩解的疏忽。

53. 应有一项关于被告国籍国接受法院管辖权的规定,以补充第21条,因为为了忠诚目的和管辖权目的,国籍是一种具体而有意义的联系。第21条第2款局部处理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要求交出疑犯的国家就是被告国籍国。

54. 第23条第1和第2款是有极好的根据的。无疑,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断定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它还断定对和平的威胁及破坏和平的行为是否存在,但它没有垄断审议因上述行为而引起的局势的权利。如果法院在安全理事会审议这种局势时不得审判疑犯,则它的管辖权将会被过分限制。此外,安全理事会近年来倾向于日益广义地解释“对和平的威胁”的概念,而且设法将它扩充,使它实际上覆盖可能发生规约分类开列的罪行的所有局势。根据在别的论坛所作的政治声明而妨碍规约所规定的机制运作,似乎是不合逻辑的。

55.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工作组已设法将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的要素综合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但案文第37条和第47条却似乎以某一刑事制度为根据。第37条

规定在异常情况下可以缺席判决,令人感到奇特的是,第2(c)款允许缺席审判,如果被告已逃离合法拘留或弃保潜逃,但如果被告从来未被逮捕的话,则法院就没有进行缺席审判的可能性作出这种区分的理由或其后果都不明确。虽然必须确认有必要着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所树立的原则,即被告必须“出席受审”,但法院进行缺席审判并将其中一些事实公诸世界舆论,可能是对国际社会有利的;法院至少可以指出犯下滔天大罪行的人,从而宣布他们为不法之徒。此外,为了避免与《盟约》有矛盾,可能可以在这些情况下不自动适用缺席宣判的徒刑而等待被告出庭和订正的裁决。

56. 第47条没有考虑到许多刑事制度仍然对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施加死刑,特别是规约草案所述的罪行。确定刑期或罚款数额的选择应予扩充,以包括确定一般的惩罚。

57. 法院的管辖权应限于惩罚国际性质的最严重罪行,接受的声明不一定导致国内法院丧失管辖权。相反,在难以或不可能审判被告的情况下,法院应协助国内法院。他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全权代表会议上审议规约草案,而且国际刑事法院最终将成为现实。

58. des ILES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名义发表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草案是一项稳当的文书,就各种若干问题提供若干折衷的写法,应有助于使尽可能多的会员国广为接受。如规约草案第2条所设想,法院应由一项多边条约设立,并与联合国签订建立关系的协议。

59. 法院的管辖权应限于国际关注的严重罪行。第20条正确地区分了两类罪行:在一般国际法下的罪行和规约附件开列的若干条约所述或所确定的罪行。法院的管辖权应补充国际刑事司法制度。1989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的支持下在第六委员会再次提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意见,它当时表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将使各国政府在证明无法在国内法院进行审判和加以引渡时,有第三种选择。一些严重罪行,诸如大规模贩卖毒品及洗钱和恐怖主义行为等有关活动,必须

通过国际机制来处理。

60. 第22条规定当一国成为规约缔约国时,法院不应自动对某些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一条的措词是正确的。虽然“选出”制度原则上可能看来比较可取,但人所确认“选入”制度更有可能使参加法院的国家更为普遍。

61. 第四部分的规定总体上令人满意。只有缔约国才能诉诸法院。在调查的初步阶段,嫌疑犯的所有权利均应获得保证,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规定那样,这一点也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第32条的措词,连同第58条的规定,将为一些小国所关注的问题提供切实的回应,因为这些国家担心审判和监禁某些国际罪犯,诸如从事大规模毒品贩卖活动的罪犯,可能使其司法制度无法应付,而且这样做会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第34条的规定极为重要,这些规定将有助于确定法院的管辖权。但必须对“有关国家”一词下定义,因为对该词作过度广泛的解释可能无助于法院的工作,而且会阻碍其运作。

62. 只有在明确界定的例外情况下,例如第37条第2款拟议的情况,才应对被告应出庭受审的一般规则作出例外。如被告缺席,其所有权利均应受尊重。

63. 无罪推定是普通法的一项公认原则。控方有责任证明被告有罪。但应于指出的是,被告也有举证责任,即他有责任证明依普通法提出的同意、威胁、自卫或一般正当理由的答辩。无罪推定反映在规约草案第40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赞成将它包括在内。它也欢迎第47条的规定。对受害者和证人的保护绝不应妨害被告获得公正审判的充分权利。第44条的规定令人满意,特别是不接受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任何证据的提议,因为这样做构成严重违反规约或国际法的行为。

64. 无疑有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常设国际机关,以便采取有效行动,对付应对国际关注的异常严重罪行负责的个人。国际社会已表明,一旦有这种政治意志,这类法庭是可以设立的,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那样。但是,她不认为可以通过成立特设法庭来拟订一套国际刑法。一个常设法院不仅会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而且也会惩罚那些以为可以逍遥法外地试图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人。为此,她赞

成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认为应在一个全权代表会议的范围内向各国政府提出规约草案。大会本届会议应成立机制,以便尽快召开这一会议,就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缔结一项公约。

65. LADGHAM夫人(突尼斯)感谢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所作的努力。她还感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工作组主席劳克福德先生和危害人类和平及治罪法专题特别报告员锡亚姆先生,他们的工作质量令人赞赏。

66. 虽然国际法委员会主要是一个技术机关,但它必须考虑到现实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与单纯法律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国际法委员会已接受了各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许多评论,包括突尼斯代表团所提出的评论,这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但是,她对草案有若干进一步的评论,首先是应如何设立法院的问题。突尼斯已表示它的倾向,认为法院应是联合国的主要机关和组成部分,因为这将使法院具有与国际法院相比的权力。如果通过修正《宪章》设立法院,则它将会比由条约设立更具普遍性。

67. 关于法院的管辖权,她高兴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已将某些代表团的意愿考虑在内。这些代表团希望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列在附录的清单内。还应作出规定,以考虑到将今后可能拟订的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列入清单的可能性。拟议除灭绝种族罪外国家可通过提出声明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制度是可以接受的。

68. 关于适用的法律,她认为治罪法草案应构成这种法律的基础。草案应作出规定,就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每一种罪行规定具体惩罚。应敦促国际法委员会迅速进行拟订治罪法草案的工作,当然它必须确保治罪法草案的规定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规定一致。

69. 法院的经费问题与法院的设立有密切联系。关于这个问题,突尼斯认为将这一负担施加于规约缔约国,如国际法委员会在草案第2条所提议的,似乎不是十分明智。由于法院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服务,因此其经费最好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这是设立法院为联合国一个主要机关的另一理由。

70. 最后,她说鉴于在实质性问题方面仍有困难,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将为时过早。比较可取的是安排协商,以期消除意见分歧。

71. HAMAI先生(阿尔及利亚)感谢国际法委员会全体成员,他们的报告质量极高,每年都对第六委员会的工作起激励作用。他还感谢韦列谢京先生清楚详尽地介绍了报告。

72. 关于报告第二章,即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他赞赏锡亚姆先生的工作,并对国际法委员会应大会第48/31号决议所交付的任务,恢复治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表示满意。治罪法草案已于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一读获得通过。国际法委员会已审议了治罪法草案中关于罪行的定义、定性和一般原则的一般性部分,但关于罪行本身的草案第二部分则尚未处理。特别报告员提议将罪行清单限于普遍同意为构成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违法行为。

73. 他还想提出若干具体评论:关于罪行的定义,他认为通过一个概念性或一般性定义并继而具体说明治罪法所界定的罪行的提议,似乎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74. 治罪法草案第5条虽然将刑事责任限于个人,但却不排除国家的责任。该条应与其他国际法律文书一并解释,例如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关于第6条,治罪法草案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之间关系是一个问题。他认为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密切相关方面,即: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适当的法律文书,使它能对那些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进行起诉;治罪法和规约是两项不可分开而相互补充的文书,从而说明这项工作的成就。为此,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处理法院的问题时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看待,而把治罪法的问题置于次要地位。应当记得,设立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概念是出于有必要设立一个适用治罪法草案的司法机关。法院的问题只是拟订治罪法草案这个总体问题下的分项目,如这个问题的过去历史所清楚表明的。当然,当前的国际悲惨事件使法院的问题具有特殊迫切性,但仓促通过法院规约而不首先界定可适用的法律是不当的。为了克服这项困难,法院规

约草案设法在第20条界定应受法院管辖的罪行,共为五类,其中只有灭绝种族罪没有造成任何重大障碍,因为已有关于这个主题的1948年公约。除了侵略以外,其他类别的罪行之所以被列入,是因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把它们定为罪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目前正致力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而这个法院将适用一项由一个政治机关--安全理事会--在一项决定中界定的法律,从而使这个政治机关看起来几乎是国际法的最高来源。国际司法必须独立于政治机关的决定;就实在国际法的现况来说,只有通过治罪法草案,才能具备今后法院所应适用的法律的主要基础。

75. 规约草案的其他规定也令人关注,特别是设立法院的方法、它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它在安全理事会根据规约草案第23条将某一事项交由它处理时的管辖权问题。

76. 关于设立法院的方式,以条约设立法院是不够的,理由是这样不能确定它会获得普遍接受,因为国家可以选择不成为条约缔约国。另一方面,如将它设立为联合国的一个机关,这不仅使法院有联合国的威信及其普遍性质为后盾,而且国际法律秩序对刑事事件的统一看法也有保证,又不会损及法院的独立自主。有人争辩这样做就必须修正《宪章》,但这一论点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因为缔结条约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此外,目前正讨论进行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也需要修正《宪章》,因此援引第一百零九条和召开审查《宪章》的大会是有可能的。

77. 与先前的问题直接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法院与联合国应有的关系。最易办的是使它成为联合国的一部分,最好是作为诸如国际法院的一个主要机关,联合国系统需要有一个司法机关来处理国际刑法的问题,填补一个真正的法律真空和避免诉诸特别的司法机构。此外,基于宪法理由和严格遵守法律的考虑,由一个政治机关设立这样的司法机构不会获得一致赞成。

78. 关于法院的权限,草案第23条赋予安全理事会权力,使它能根据《宪章》第七章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诉,从而减损了第21条关于法院的权限视国家是否接受而定的规则。无可否认,《宪章》分配给安全理事会的职能将大大扩充,而扩充的后果却

未予充分考虑,更甚的是,它缺乏适当的法律基础。鉴于这一提议未获国际法委员会一致赞成,这一条应予删除。此外,拟议的解决办法忽视了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方面的特权。

79. PREDA先生(罗马尼亚)说他欢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草案工作的结束,因为这是国际法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缺点,即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只要没有司法机关审判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这一领域的国际法就未有进行实质性的编纂工作。

80. 关于设立法院的问题,他说应以一项在国家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的方式设立法院。这个方法有保证公约获得广泛接受的实际好处,而广泛接受是法院发挥效力和运作正常的先决条件。此外,这个方法保留了国家的选择自由,它可以成为规约缔约国或接受法院的管辖权。鉴于这个过程错综复杂,根据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来设立法院是有其诱惑性的,但这将超越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所享有的权力范围。而且,诸如修正《宪章》或通过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决议等备选程序会产生种种严重的问题,不易于克服。关于今后会议的日期,他想知道设立一个休会期间特设委员会以讨论有关问题是否恰当。

81. 关于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他说将来的法院应与联合国主要机关挂钩,使它能从行政和发挥功能的观点有效地运作。但是,鉴于它不应是一个附属机关,他同意规约草案第2条的规定,认为应缔结一项协定,以便建立适当的关系。

82. 法院应对数目极有限的非常严重的罪行有属物管辖权。在现阶段,这些罪行应包括灭绝种族、侵略、特别严重的罪行以及有系统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上述假定的事实根据是:只有在异常情况下,国家才愿意放弃其主权,向一个国际机制让步。他最后表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案文涉及许多可能被视为技术细节的问题,但综合来看,其核心就是公平审判的问题。

83. KOLODKIN先生(俄罗斯联邦)说,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成果斐然,其杰出的成就正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该案文应是今后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础,直到草拟工作完成为止,因为它载有既稳当又合理的规则和解决办法。

84. 法院的管辖权既适用于各项生效条约所界定的国际罪行,也适用于违反国际法的一般罪行,这些罪行局限于一系列具体的情况。应视法院的管辖权为国家司法制度的补充。它对传统上适用或引渡或审判原则的罪行的适用程度,视某些条件是否符合而定,因此具有特殊性质。与此同时,在异常情况下,如安全理事会认为这些罪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法院的管辖权实际上成为强制性,因为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可以不顾草案第21条关于接受的先决条件,向法院提出申诉。

85. 报告清楚表明,缔结公约是设立法院的最可取办法,而且是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方式。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都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们发觉草案的新案文已将它们的评论考虑在内。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也证明国际法委员会精于就最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当然,我们仍应对规约草案的具体规定提出评论,以期改善案文,但要求设法不要改变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达致的平衡,也不算过分。

86. 归根结底,除了就各项规定提出评论以外,在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必须决定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而且设立这一机构的法律和政治条件是否存在。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如果再次无限期地推迟法院的设立,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87. 联合国头几次尝试设立常设刑事法院的努力实际上是在1940年晚期作出的。1951年,奉大会的指示,国际刑事管辖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但当时的时机尚未成熟,没有什么结果。如果它有任何发展,那是令人惊奇的,但鉴于国际舞台上已产生了确实无疑的变化,如果历史再重复的话,那将会令人更加惊奇,而且是不太可能的。今天已存在一些全人类都分享的普遍价值,它们已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此外,已有在“征服者--被征服者”关系以外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先例,而这又理所当然地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成立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和平并保护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免受个别罪犯和罪犯集团的破坏,现在该是联合国设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时候了。

88. 大家都了解,规约草案的拟就和定稿将需要一些时间,多等一两年并不是问题,但要紧的是现在必须作出决定,清楚表明成员国具有政治意志要将它付诸实行。为此目的,应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在特定期限内组织一次联合国会议,其明确目标是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这是国际社会期望联合国作出的反应。

89. FLORES夫人(乌拉圭)说,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已证明成果丰硕,特别是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和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方面。

90.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虽然可追溯至几十年前,但在大会1992年11月25日第47/33号决议之后,它现在已成为优先事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促使安全理事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以及将该法庭的任务扩充以包括卢旺达境内侵犯人权事件的可能性,这个进程已经加速。

91. 专门法院数目日益增加的前景,加上了适用法律不可靠、不一致和不统一的可能性,而必须对特别紧张的国际局势作出适当反应就更不用说了,上述各种因素都意味这个问题在目前是有特殊意义的。因此,她赞成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17段的建议,即召开一次全权代表国际会议,以便研究规约草案并缔结一项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此外,乌拉圭认为,鉴于法院的地位,它应当是联合国的一个机关。

92. 考虑到法院的性质、复杂性和特定活动,而且可能在其管辖权下的案件日益增加,她赞成设立一个常设机关,全时工作。但是,她了解到有些人比较喜欢一个逐渐执行的更灵活的解决办法,因为这可能涉及种种经济困难和实际困难。

93. 适用的法律必须是国际公法,虽然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基于这个理由,而且由于这个问题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密切相关但不是单独有关,尽早将规约草案定稿是可取的。

94. 有关法院管辖权的总理规约草案的骨干,在第三部分加以处理。就属于管辖权来说,在目前情况下看来法院只能审判个人。尽管如此,规约第20条的规定应与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第19条的规定一致,其中将国际罪行和国际犯罪行为,与国家除了有义务对所犯罪行提供赔偿以外还可能遭受制裁的情况加以区分。此外,必

须澄清侵略罪行的定义(规约草案第20(b)条),因为根据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这些罪行只能由国家犯下;这项定义也应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15条一致。她还对第23条的规定表示保留。

95. 属事管辖权极端复杂,因此必须确保刑法两项原则的适当适用:法无明文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者不罚。规约草案部分适用了这两项原则。

96. 虽然从严格的法律观点看国际法不禁止制度审判,但当前的人权趋势却限制这类审判,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4条第3(d)款所示那样。

97. 乌拉圭已表示它赞成设立检察官一职,并同意规约草案提议的结构。

98. RABBANI先生(巴基斯坦)说,必须颁布实体法,以执行第19条第1(b)款的规定。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程序性细节应由法院的规则制订,但为了确保公正的司法过程,这些规则必须成为规约的一部分。此外,第20条所列举的罪行必须界定得更明确,特别是“侵略”一词。

99. 规约草案第八部分所述的关于执法的规定令人关注,因为它们在许多成员国内引起了重要的宪政问题。另一种做法是,法院的命令可以按照国际法所界定的各项规定执行。

100. 第23条第3款须予进一步审议,因为不能排除因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而致使司法程序政治化的可能性。

101. 必须清楚阐明实体法、程序法和法院规则,以保证疑犯和被告的公民权利。不然的话,成员国难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在国际司法制度中应特别注意保障被告的权利,并考虑到一些从国家观点看往往可能不重要的因素。

102. 为了避免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关于法官所需的资格、他们可能遭受的纪律处分以及调查和审判程序,都必须更明确地具体说明。

103. 法院应补充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并应在有需要时开庭。此外,法院的管辖权应限于个人而不应涉及国家,因为这将违反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权利。

104.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和第5条所述的附属机关和其他基础设施都意味必须有

大量经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是额外的负担。

105. 除非发展实体刑法,确切界定国际罪行和规定这些罪行应有惩罚,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展。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牵涉到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例如管辖权、可适用的法律、法院结构、起诉和其他事项,这些问题都必须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处理。

下午1时10分散会